

客家

研究论丛

第一辑

中华

主编 汪祖德 许怀林 王东林

江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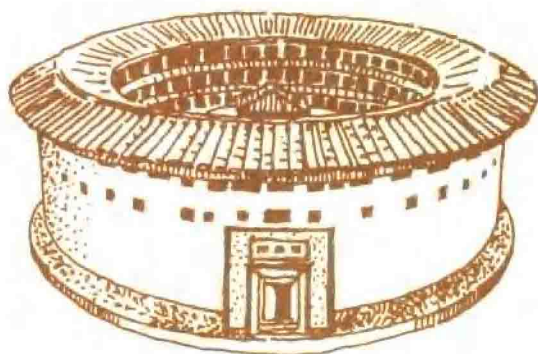
.1-55

96
K281.1-55
11
231

中华客家 研究论丛

主编：汪祖德 许怀林 王东林

第一辑



江西人民出版社

355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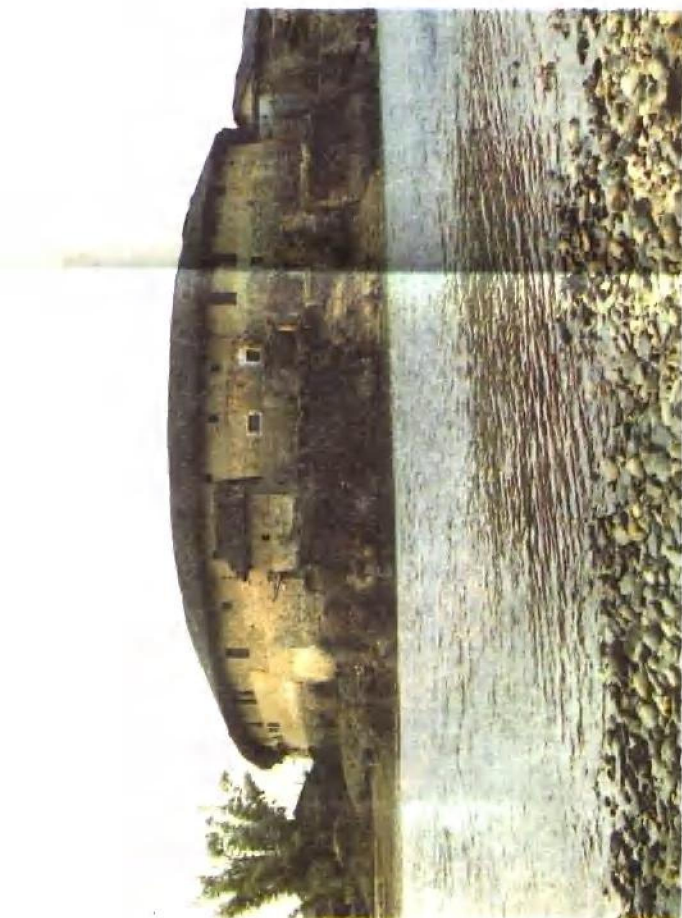
(赣)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一辑)
作 者:汪祖德 许怀林 王东林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经 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一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60 千
版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定 价:10.00 元
ISBN 7—210—01600—7/G·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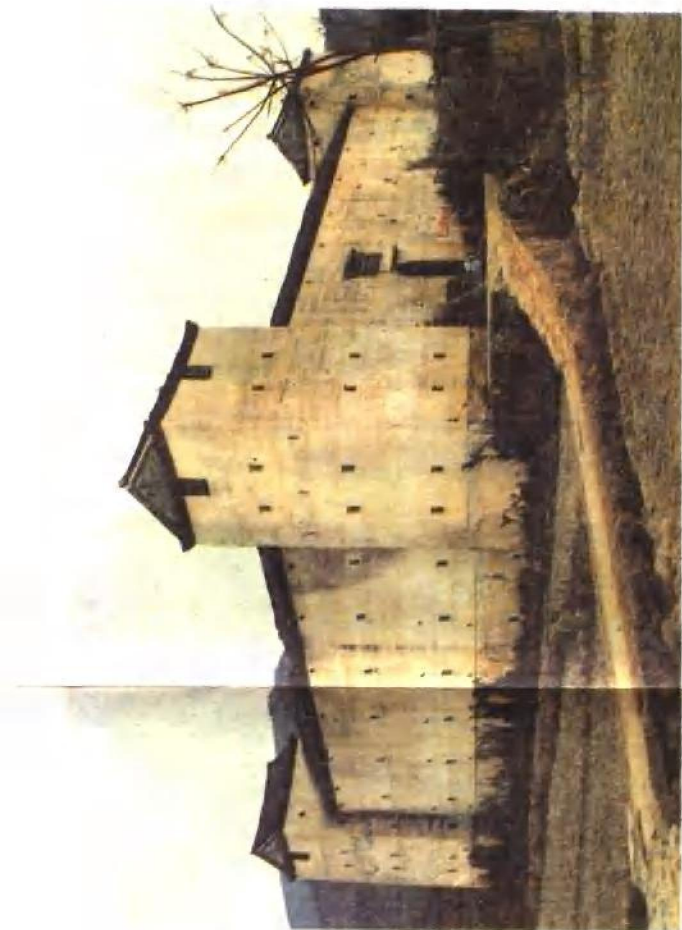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33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的出版和材料的调查工作，得到赣州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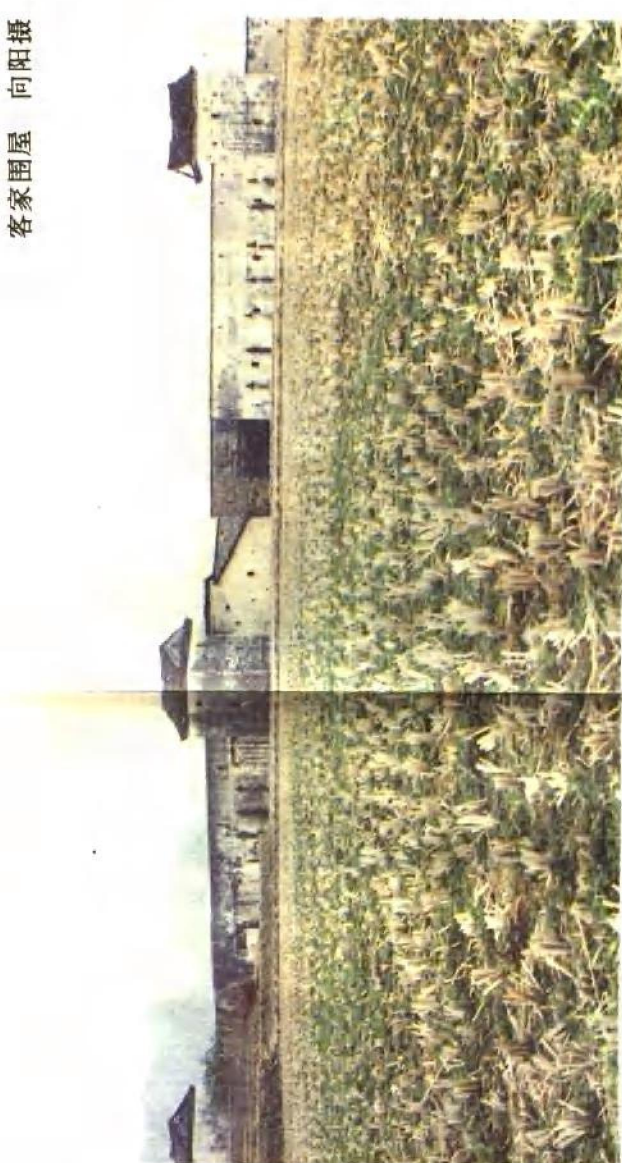
赣南圆形围屋 向阳摄



客家围屋 向阳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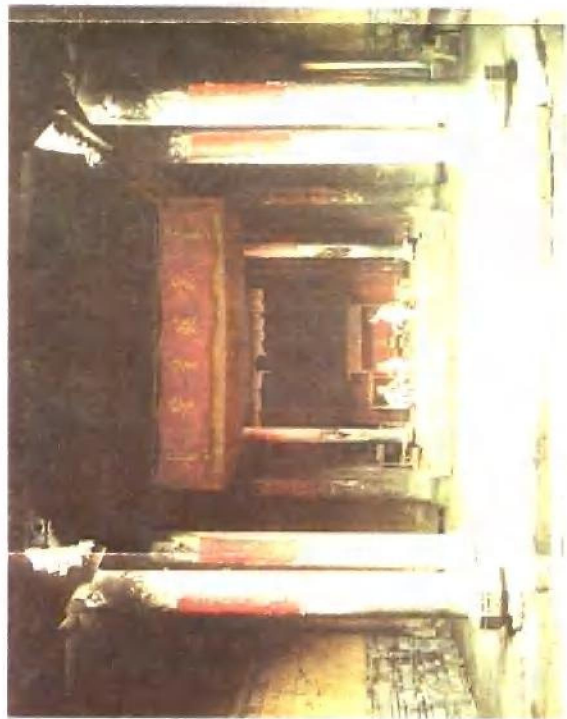
围屋内视 向阳摄



客家围屋 向阳摄



水酒米果迎客人 龙年海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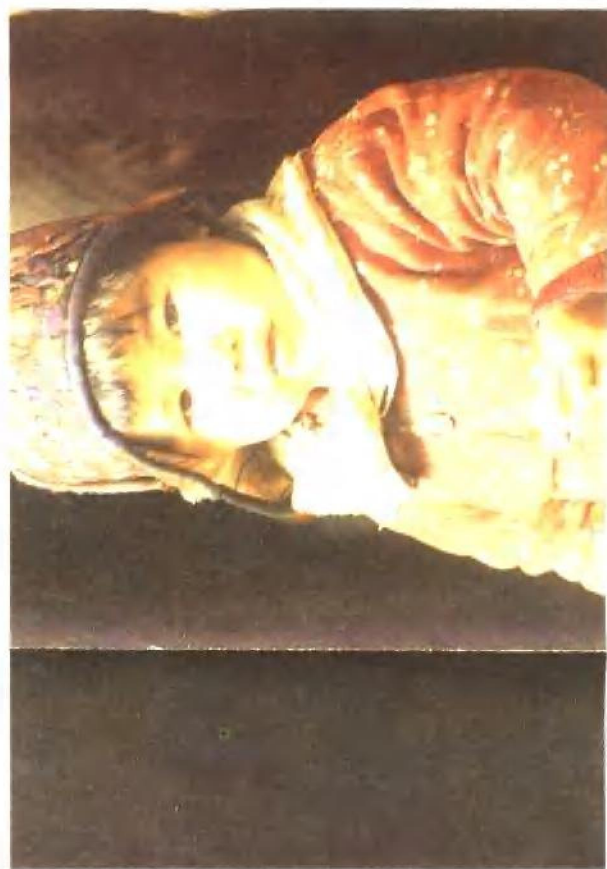
围屋内的祠堂 龙年海摄



赣南客家妇女的头饰 龙年海摄



赣南的客家妇女 龙年海摄



客家小女孩 龙年海摄

序

姚公骞

《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一辑即将出版,这对学术界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推动我国客家学的深入研究,而这一研究对于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民族中的民系问题,如何阐释客家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反复的迁徙、流转中和相对的稳定中,竟保持住了它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和性格等方面的许多特征问题,都大有裨益。人们经常说,客家人在不同的生活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既有十分顽强的凝固、保守的一面,又有极为灵活的适应、自强的一面,两者相反相成,和谐地融为一体,使得客家人既可以由平原进入山地,又可以由山地流向江海,更可以由江海飘过大洋,不管是在平原、山地,还是在江海或大洋彼岸,他们所到之处,都能扎根繁衍、开花结果,开创出令人称道、忻羨甚至赞美、崇敬的事业。例如,居于江西山区的客家人就曾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居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客家人,有许多人在经营工商业,在发展现代企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还有不少现在散居在港、澳、台,有不少留居于欧、亚、美,成了有名的企业家,他们怀着对祖国的眷注亲情,正在为发展家乡的建设事业,作出有力的贡献。因此,开展客家学的研究便不仅仅有必要去探求客家民系在历史上的源流演变,也不仅仅有必要去发掘作为客家人的诸多特征的形成条件及其历史作用,它的现实意义更在于加强海内外客家人的联系与认同,进一步取得振兴中华的共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充分发挥客家人的聪明才智和经济实力上,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

多更大的贡献。

江西是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汉民系自中原南迁而来,几经流转,渡江进入江南山地,它的第一个聚居点应在江西,后来再由江西而进入闽、广。明清之际,江西有好几次人口大迁徙,现在留居在江西的客家人就有许多是由闽、广返迁过来的,因而江西的客家人既有始迁者的后裔,又有返迁者的后裔,其间错综复杂,想要理清它的来龙去脉,颇为不易。有人说,江西是客家民系得以形成的摇篮,“客家”之得名当在江西。此说目前虽然还未成为定论,我却颇为赞同,盖从历史地理和文化积淀等方面综合加以考求,则此说实未越出情理之外,当然,最终要成为定论,还有待于深入扎实的调查和考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江西学术界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几乎成了一个空白,这种状况,很不利于弄清客家民系的本来面目,也有损于对客家民系获得整体上的认识,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值得庆幸的是,《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一辑的出版,可以说在弥补这个缺陷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其中有着大量的篇幅是研究江西客家的,虽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然而,它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说服力,我之所以说它迈出了一大步,也就是指它正朝着客家学的科学之门接近了一大步。

作为客家学来说,它既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所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古建筑学、心理学等方面。细分起来,史学还应包括谱牒学、姓氏源流学;地理学应包括区域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应包括人口学,等等。当然,还少不了华侨史和侨乡史等方面的研究,所以建立与完善客家学这门学科,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它需要多方面的专家的参与和协作,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把客家学真正建立起来。过去罗香林先生对客家人的研究虽然

有开创之功,可惜的是,由于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许多条件的不具备,靠单枪匹马,势难兼顾,结果自然是厥功虽伟,而所失亦多。今天不能再像罗先生那样单干了,《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一辑的出版,就是以一种集体的、协作的新面貌与读者见面了。从所收的13篇文章来看,有理论上的探讨,有语言、民俗、地理和建筑等特征的研究,向读者展示出了有关客家民系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与罗先生当日从事研究的条件相较,真说得上今非昔比了。我在欣慰之余,愿借此机会提出一点希望,希望在编辑出版《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的基础上,在有关方面的倡导下,在江西形成一个客家学的研究中心,使客家学的研究能够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计划更加具体,合作更加协调,力量更加集中,分工更加周密和明确,这样一来,成效必定愈益显著,成果必定既丰且硕,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客家学的建立与发展就指日可待了。

我愿再一次借此机会,为《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一辑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作者和出版部门致以衷心谢忱,并希望能陆续看到第二辑、第三辑以至于第n集的问世。谨序。

一九九四年于南昌北面斋

时年七十

目 录

序

姚公骥(1)

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

汪祖德(1)

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民系的思考

许怀林(13)

民系理论的初步探索

——客家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王东林(46)

“客家”概念的新诠释

王东林(59)

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

——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

王东林 胡业雄(71)

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

许怀林(85)

从兴国移民姓氏看赣南客家迁徙

——对研究赣南早期客家的一种思考

梁洪生(99)

江西泰和中龙乡客家民区蔡氏契据及其相关问题

梁洪生(122)

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形成年代的语言学推断

张卫东(148)

江西客家话的分布及特点

颜 森(156)

家教与客家精神散论

陈解生(167)

试谈赣南客家菜

李海根(177)

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

——兼谈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

韩振飞(201)

后 记

(221)

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

客家研究肇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它与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社会问题扭结在一起,形成多次研究高潮,影响及于国内外学术界与社会诸多阶层。至本世纪 30 年代,罗香林先生推出全面论述客家历史的力作《客家研究导论》,使客家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尔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客家研究在大陆逐渐“冷却”,以致“客家”问题成为知识界一门颇为生僻的学问,鲜人问津。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客家研究已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兼之海外客属团体与学人雅士的推波助澜,业已形成一个新的热潮。研究会、联谊会纷纷建立,期刊、报纸时有新出,文章多,会议也多,可谓盛况空前。作为客家主要聚居地之一且又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的江西学术界,也从以往封闭中走了出来,加入了客家的研究行列。

毫无疑问,客家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与时代课题。时下的“客家热”也的确涌现出许多令人兴奋的成果,解决了一些问题。然而仍有一些学者(如吴泽先生等)认为近年的客家研究,没有超过罗香林先生 30 年代的水平。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笔者由惊愕转为赞同此类看法。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笔者希望客家研究的大好局面能长此以往,并且有一个质的突破;客家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更多学界同仁的认可与嘉许,从而在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诸领域中占领应有的一席之地,故斗胆直陈,草就此文。

目前客家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固然在于“大多数止于就事

论事,很少触及这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远不足以涵盖客家民系千百年来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的、个别的、辩论性的研究阶段,尚未上升到系统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阶段”^[1];在于“未加分析,寻章摘句……陈陈相因,沿袭《导论》旧说”^[2]。笔者还感觉到个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感情主义的束缚,未能实现理性的超越。

历史上的客家研究是在当时华南地区土客矛盾激化,争斗的频繁,社会上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对客家这一庞大的移民群体给予的种种偏见和鄙视的背景下出现的。为了从文化上反击社会敌对势力视客家为“客贼”,“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客家乃山地野蛮退化部落”的种种侮辱,客家民系中的知识阶层纷纷起来论证客家的汉族源流,并相继成立了“客家源流研究会”、“客家源流调查会”、“客系大同会”等组织,以传单、报刊、著作的形式向社会介绍客家的谱系族源、文化习俗与历史功绩。所谓矫枉必须过正,这些对自己的民系饱含感情的研究者们,为了维系集团的团结力以及客家的正统性,也开始借助于一些外国学者的论述与谱牒资料,神化自己的来龙去脉,美化自己的社会、文化特点及价值观念。自罗香林先生发表《客家研究导论》以来,这种感情主义(日本学者称为“客家的民族主义”)的客家历史体系便被建构起来,并且一直相沿至今。即便是罗氏自己认为的因“研究日短,材料不备,虽欲论列,穷其究竟,而为事势所不许”^[3]而留下的种种缺憾,也成为后继者竭力论证、渲染的历史话题。

时下客家研究中存在的感情主义问题,除有其历史根源外,还与客家研究的队伍成分有关。客家问题的研究者与支持者,绝大多数是具有浓厚的民系自豪感的客家人,非客家人士比较少。这种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重合,以及联谊活动中屡屡出现的感人至深的场景,在深笃乡情的同时,也必然使研究中的感情主义倾向更加强烈。这种倾向难免影响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从而削弱了结论的

准确性与科学性。

客家研究必须率先解决的基本概念问题,如“客家”等,至今仍然是比较模糊的。在感情主义研究心理的驱使下,为了证明“客家”一名得来很早,自古有之,借以表现客家历史的源远流长,于是不加区别地在史籍中搜寻依据,附会假说,因而相率认为:“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发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其后到了唐末,政府薄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4]其实东晋的“给客制度”是封建国家在承认豪强世家占有劳动力的前提下,限制其占有劳动者的数量,以保证朝廷有足够的课役来源的一种制度,是封建国家与门阀地主争夺劳力在经济制度上的反映。所给之客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依附农民,与“客家”风马牛不相及。晋代的“客”皆注家籍,隶主人名下。到唐中期,由于门阀士族地主势力的衰落,“客”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人身束缚有所松弛。唐玄宗时,宇文融检括户口,得客户八十余万,全部编入国家户籍。北宋户籍分主、客户。主户五等,是拥有土地的人户,包括大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阶层。客户是指没有土地需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一旦他们在获得了小块土地之后,也可上升为主户。主、客之分,南北皆然,与“客家”仍然毫不相干。这些问题在史学界早有定论,已成一般历史常识;然而在客家研究中,这种错误却相延半个多世纪,的确令人诧异^[5]。

为了强调客家与中原祖地的联系性,编排客家名人辈出的群英谱,有的研究者不恰当地扩大了客家外延,举凡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家无不视为客家。于是薛仁贵、郭子仪、钟绍京、岳飞、欧阳修、王安石、朱熹、文天祥、李烈钧等人都归入了客家名人的行列。这种“泛客家论”无视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的独特内涵,混淆民系差异性,

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客家的存在。这种认识的逻辑归宿必然是天下无处不客家。推而言之，我们甚至可以说美洲的客家最多，因为那里除了几近灭绝的印第安人以外，全都是外来移民。

感情主义客家研究的最大危害是，在客家研究领域内滋生了变相的、陈腐的“种族(民系)优越论”与“纯粹血统论”。比如说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有如牛乳中之乳酪一般”；“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就是客家人”；“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保留的、保守的，但客家人例外，因为客家人的特性，客家人的精神，都是革命的，进取的”；“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为了支撑这些近乎荒诞的命题，一些感情主义的客家研究者开始从血统、遗传、革命精神的历史表现等方面展开必然复归于荒诞的论证。

首先是“纯粹血统”的提出。这里他们借用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Ellsworth Huntington)的话：“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于是客家被誉为最重“保种”、“保族”的人。“保种”是保持自己血统的纯粹，不与外族通婚；“保族”是保持自己的民族属性不变。或许还包涵了延续家族烟火的意思。《客家学研究》第二辑有文章对客畬通婚之说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批评，并认为客家“长期受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以及自身的血统优越感的关系，因而对畬族采取鄙视的态度，更谈不上与他们发生婚姻关系”。彻底否认了客家与外族通婚的事实。然而在该文的结尾却又自顾不暇地露出了破绽：“在封建社会，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以及汉族具有较高的生产方式等原因的影响，畬族无法摆脱要么迁徙保种(如迁往闽东深山老林)，要么和汉族认同而被汉化的命运。那些与外种人通婚的畬族人后裔，正是客畬杂居地区的已被汉化了的那部分畬族后裔。而严格说，他们已经是汉人，不再是畬民了，因为他们失去了独立的

生产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从而也失去了保持纯洁的民族血统的意义。”^{〔6〕}“汉化”是指失去本民族的固有特性而与汉族融合于一炉。难道汉化了畬族后裔(指单纯失去独立生产生活方式与语言习俗者)就突然消失了原有的血统吗?他们与客家人的通婚就不再产生血统混化的事实吗?客家人以其较高的文明带动了畬族的汉化,况且汉化的过程本身就存在着通婚、生育、血统交融的现象。汉化既是文化上的,也是血统上的。关于血统的讨论,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纯然不杂的血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混杂的现象。客畬通婚问题,我们在社会调查中已经获得一些肯定的事例。罗香林先生虽也大谈客家民系的优越性以及强者的遗传,然于“纯粹血统”问题出言也比较客观、谨慎。他说:“客家初到广东、福建的时候,不能不同畬族互相接触。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中,没有健壮的体魄而要到达安全的境地是很困难的。所以能携同原日妻室抵达的人,自然不必遽与土著通婚,但其他没有原日妻室同时废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妇女为妻了。”当然,这里罗氏没有明说土著就是畬民,但畬民却是土著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肯定的。因此,罗氏在《客家源流考》一书的“结论”部分于引用的韩廷敦氏的话之后,又郑重说明:“所谓‘纯粹’,固然是比较的说法”^{〔7〕}。同“纯粹血统论者”区别了开来。但罗氏依然是一位“血统论”者。他认为客家人的上代原本是中原贵胄,他们在辗转南下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和惨酷牺牲,由于自然与社会诸因素的淘汰与选择的作用,使最终到达目的地的,都是一些被选择的强者。“所以在种族的遗传说来,客家民系实在是一群强者的血统。他们之所以能保世滋大,全在他们有这种强者的遗传;他们之所以能抵抗一切的压力,从事各种革命运动,也全在他们有这种强者的遗传。这遗传是曾经付了很大的代价,才获得的。所以客家人士,自来也很重视他们的血统。”^{〔8〕}

早期的客家研究者,为了申明自己的汉族族性,标榜自己的血

统纯粹或血统优异，借以抗击社会上视客家为少数民族，为“山地野蛮、落后部落”的种种歧视，因而对“混血”之说尤其忌讳，这是特殊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时至今日，客家人面临的社会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客家人的汉族性质和历史地位已为世人公认，歧视现象已不复存在，再去重弹旧调，不仅于时宜不合，而且也潜藏着新的民族歧视的因素，不利于民族的大团结。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不谈为好。

关于客家人源出中原贵胄，是支撑“客家民系优越论”的另一个古代历史依据。其说发绪于罗香林等早期客家研究者，而时下的“客家热”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大凡客家人所有的生活习俗与优良传统都是因为他们祖出中原的衣冠士族。论证的过程无非是：“客家先民几乎都是中原人士，并且多‘衣冠’、‘士族’之人”，所以客家人是中原衣冠的后裔，因而也就继承了中原衣冠之家“以门户自高”、重“木本水源”、念祖孝悌、敦亲睦族、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功名等习俗传统，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正统观念。

所谓“士族”，指东汉以后地主阶级内部形成的享有政治与经济特权的高级阶层，由各地大姓豪族构成。又称势族、门阀世族、衣冠望族、世家大族。非士族的地主阶级则称为庶族、寒门。士族占有大片的土地和劳动人手，政治上世代高官。家世声名是衡量身份地位的最高标准，因而他们最重谱牒，官府设有专门的谱局，“有司选举，必稽族谱而考其真伪”。他们也非常注意保持其高贵的血统，实行士族内婚制，讲究门当户对，严防“婚宦失类”。永嘉之乱后，士族随晋室渡江。王导等北方大族联合南方土著士族共同辅佐东晋元帝司马睿稳定统治。登基大典上，司马睿为表谢意，要拉王导共坐御床，因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士族势力发展到顶峰。南朝时期，士族逐渐走向衰落，经历次政治变乱与农民起义的打击，于唐末退出了历史舞台。

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高级特权阶层，人数不在多数。自东晋至

刘宋末,大量的北方人民为避战乱而分次南迁。在庞大的移民浪潮中,士族所占比例极少。而且士族中的右姓又多迁建康一带,与客家先民关系不大。至于进入赣、闽、粤山区成为客家人的移民中,世家大族更是微乎其微,对客家民系属性的形成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况且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孕育阶段,门阀士族正处于衰落时期。保证士族垄断政权的选官制度开始变化,南齐时出现了寒人掌选,梁朝选官则已是“无复膏粱、寒素之隔”^[9];士籍冒滥,谱牒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性;“婚媾沦杂,罔计厮庶”^[10]。士族本身的腐朽更是惊人。他们由于有特权保障,尽管朝代更替,地位依然如故,因而在政治上不求振作,以空话为荣,实干为耻,甚至“不乐武位”^[11],以不问军国大事为清高。他们只想着自己,关心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将国事抛于脑后,更不用说有什么强烈的民族意识了。他们凭出身为官,不必发奋进取,因而多为不学无术之士,“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12],以作弊为能事,根本谈不上推崇知识和教育。生活上极端奢侈腐化,“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3]。哪里找得到客家人克勤克俭的精神来?公元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这些长期过着腐朽寄生生活的大族们“肤脆骨柔,不堪于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14]“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15]没有一点在政治风云中的应变能力。“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余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16]又有几个进入赣、闽、粤山区成为客家?东晋至北宋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期,也是门阀士族由巅峰走向衰落,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秋霜期。这个时期士族的腐朽性已暴露无遗,这样的士族风气难道还有什么承继的价值及夸矜的荣耀吗?

通常在论证客家源系中原贵胄时,照例要引述一大通族谱资料。中国的家谱无不从“受姓之始”谈起,而且必定要列出若干代以前的某个祖宗曾是高官显宦。故俗语云:无高官显贵不成姓谱。元